

## · 专 论 ·

# “知识傲慢行为”与文化自觉

## ——《学术殖民主义在行动：美国认证他国大学》读后

何雪莲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美国认证他国大学是一种学术殖民主义行为, 是美国所推行的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 让人警醒。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 我们不仅要树立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观念, 而且还要置身于全球化大背景中, 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危机。大学要肩负起文化批判与文化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具有文化自觉的当代知识分子, 不仅要立足于学术和知识, 更要立足于人格担当, 并具备一种忧患意识。

**关键词:** 文化; 全球化; 大学;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59(2004)02-0055-03

### “Arrogant Behavior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Consciousness

HE Xue-lia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behavior of America's legalizing the universities of other countries is a behavior of academic colonialism, which reflects hegemony and makes us alert. Culture is a stable existence manner formed historically. Not only must we get the view of political-economic mutual effect, but also link it with globalization, and realize the crisis of national culture. Universities should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culture reflection and critique. As an intellectual with culture consciousness, we should have academic knowledge and consummate personality, as well as consciousness of suffering.

**Key words:** Culture;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时至今日,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文化不是单纯的观念性的存在,它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在人类社会中,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外在的、被决定的领域而存在,而是作为活动机理、图式、机制、内驱力的维度内化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一切社会领域之中。正因为如此,经济的全球化带来深刻的民族文化危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国教授菲利普·G·阿特巴赫的《学术殖民主义在行动:美国认证他国大学》<sup>[1]</sup>一文,使我们动情动思。

“如果不让与伊拉克相似的逻辑走得更远的话,美国高等教育试图在外国驻扎半永久性认证部队吗?我们想对那些知识传统和高等教育背景极不相同的国家里的、经过美国认证的大学所制订的学术政策承担责任吗?我们真的想对确保其它国家的学术和院校标准与美国相匹配承担责任吗?我们相信每个学术运作适合于其它国家吗?”作为一名具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阿特巴赫教授提出“与伊拉克相似的

逻辑”,而这也正是理解为什么把“美国认证他国大学”这么一个具体而微的行为与“学术殖民主义”挂起钩来的关键所在。

发生在今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使我们想起当年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和美国的对抗: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确是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并以文明的名义把它变成自己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从而为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乃至在中国海域进行侦察飞机等等一系列非正义军事行动提供保障,却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必然结果。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所犯下的罪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采取的帝国主义策略,并不能依靠美国在东亚完成“次殖民”的结局来清算,美国更没有权力在行帝国主义之实的同时扮演文明上帝的审判角色。然而时隔数十年之后,作为超级军事大国和经济强国的美国,又傲慢地套用了其一贯思维模式:以抽象的正义之名,对于对象具体的非正义性进行审判,只字不提自己的所有非正义和非人道行径。于是就有了对萨达姆政权的“无道”和对伊拉克人民的“愚昧”进行

制裁和拯救的伊拉克战争。

反观这一段历史和现实,我们看到美国认证他国大学背后的逻辑与“伊拉克逻辑”何其相似!阿特巴赫教授提出的“与伊拉克相似的逻辑”就是:以服务为名,对不同学术系统及其传统的大学进行认证,而不问自己何以具有认证他国大学的权力,何以成为文明的代言人,何以忽视在他国所造成的“自愿接受的、与当地情况并不相关的外部规范存在潜在的危險结果”。仅仅是因为“美国拥有悠久且极其成功的院校及其项目认证历史”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必须要考虑到国家和地区实际。一种国际性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找到,仅仅采用世界最强大学术系统的规范和制度肯定是一个馊主意。”所谓“南桔北枳”,对于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之命脉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视而不见,而“向海外大学挥舞美国认证‘魔杖’,期望赋予他们即时性名望”,这样做是“服务”吗?“就像世界军事超级大国对海外进行干预需要小心一样,即使特殊的美国‘学术侵略’在国外受到欢迎甚至承他国之邀,美国作为一个学术超级大国,也有义务不在全球泛滥用其学术强势。外国认证是一种知识傲慢行为,其意蕴远远超出传统的院校评价范畴。”作为一个学术超级大国,美国有义务不在全球滥用其学术强势。应该说,美国太缺乏一种自律精神了,其认证他国大学的举动,已远远超出了“知识傲慢行为”。

## 二

民族国家之间利害关系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最现实的土壤。伊拉克人民与世界越来越不相信堂皇而伪善的借口。如果说美国认证他国大学背后的逻辑和“与伊拉克相似的逻辑”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美国把一种强制认同巧妙地转化为一种引诱认同。“随着大学招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以及毕业生安置的国际性越来越突出,国际认可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认证似乎是一个捷径。美国认证机构可能认为他们只是在为请求认证的其他大学开展服务而已。”这种假“开展服务”之名推行或传播单一性与压迫性之实,让我们想起了话语权问题,而一个国家或民族说话声音的大小和分量又与其综合实力息息相关。我们要树立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观念。

文化总体上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互动,文化才能植根于现实基础之上,才能适应现状、保持文化活力、保证文化的凝聚力。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的发展与精神的健壮是肉与灵的关系,缺一不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上有没有地位,首先取决于经济力量,取决于国家的强弱。16-18世纪,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庶、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优秀的文化、优雅的艺术、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

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

世界上的盛、衰都非永驻,而是变化不息的。昔日之盛,可以成为明日之衰;今日之弱者,可以成为来日之强者。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影响力,对世界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首先要提高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经济实力,加速社会发展,全面提高民族素质。当然,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身就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 三

如果我们再去看去,美国认证他国大学的行为是与其所鼓吹的“全球化”一脉相承。学术界所指的“全球化”是,持有文化共生观念,重视边缘的价值创造性取向,从而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超越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而美国政治经济界所鼓吹的,却是美国的全球意识和本国身份认同,通过推广全球意识来确立全球的领导地位,建立令人信服的国家形象。美国政府最早提出全球联系网络化,借此扩大全球市场,影响各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

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sup>[2]</sup>。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式的文化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当美国不断将《独立宣言》中的三个关键词——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经由各种包装方式销往世界各地的時候,加拿大的学人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而德国前领导人则回溯到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重申自由、公正和团结。

民族文化危机在后发国家的表现更为紧迫和复杂。除了受到外界文化的挤压之外,弱势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险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觉之后的自我削弱,这种历史健忘症、文化软骨病会给本来正需要大力发展和倡扬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响到全球竞争时代的本土精神实力。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所引发的不平衡性、边缘性乃至被摧毁的可能性,不能不引发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文化使命的思考:即进行全球化时代人类自觉的自我批判和对社会主体的文化启蒙。这表现为对文化理性的反思、理性的批判、文化精神的生成和重建,表现为对原有文化体系和教条的不断超越。在这种意义上,大学的文化理性和文化反思应当是社会最活跃的生命之流,它以清醒的自我意识不断捕捉、预见、引导新文化精神的生成,为人的存在提供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启蒙。“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高校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sup>[3]</sup>。

#### 四

真正可怕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威胁,而是我们自身的麻木不仁。在强势文化的阴影笼罩下,一些知识者只关切异域话语,忽略本土文化问题,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术语移植、问题模仿,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其实不过是遵循强势文化的历史思想脉络重新走一遍他者的来时旧路,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思维论、方法论方面的新见与启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却是更为重要的处身性文化问题。

阿特巴赫教授指出:“诚然,没人强迫外国学术机构接受美国的认证。相反,他们自觉自愿。”这里,费孝通先生多次提及的文化自觉再一次给我们以警示。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倡导者和传播者,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

文化自觉需要我们对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晓该文化的诞生、形成过程,知晓该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了解该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了解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文化自觉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处世心态,一种精神境界,最终应当是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与关怀。当“认证属一种自愿行为,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机构逼迫任何外国院校接受认证”时,文化自觉首先要求我们对其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当代知识分子的立足点固然是学术和知识,但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立足点,这就是人格担当。只有“站在人类共有的人格尊严的地平线上,中西文化才可以彼此互相正视,互相了解”<sup>[4]</sup>。在人格担当上,熊十力曾告诫我们:一个人,一个族类,都有自身内在的大宝藏,如果不善于“自力开辟”、“自立创造”,反而“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放弃主体性、特殊性、民族性、个体性,那就很容易沦为浮游无根的精神弃儿。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特质,只能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

此外,忧患意识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理论的、哲学的思考,并内化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观念和一种生活和学习的动力。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爱德华·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以及斯皮瓦克提

出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揭示出,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互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大危机可能是文化的“认同危机”。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将是这些国家、民族发展的最大悲哀。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唤起民族的忧患意识;要唤起忧患意识,又必须从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开始。

同时,忧患意识将使我们清醒地看待20世纪西方强势文化与中国弱势文化的巨大落差。那种过于乐观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中华文明将成为未来全球文化的主导力量”的盲目自信,除了迎合国人久遭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外,无助于真正认清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准确位置,只能制造“走向世界”的幻象。在阻碍借鉴世界先进文明的同时,反而会给文化侵略以可乘之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吸纳借鉴本身就是一种安全。

我们期待,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创造将是多种文化互补融合,只有赢家没有输家的过程。费孝通先生它精辟地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sup>[5]</sup>。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鲁迅关于文化的发展曾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文化偏至论》)这样一句非常简明又非常深刻的话在当代依然值得我们奉为圭臬。

#### 参考文献

- [1](美)菲力普·G·阿特巴赫. 陈运超译. 学术殖民主义在行动:美国认证他国大学[J]. 复旦教育论坛,2003,(6). (注:本文引文如无标注,皆引自此文)
- [2][3](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 柴方国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62.
- [4]徐复观. 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M]. 台湾中央书局,1957.
- [5]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1997,(3).

(责任编辑:张慧洁)

收稿日期:2003-12-20

作者简介:何雪莲,1975年生,女,江西新余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